

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丛书

中共陕西历史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编

人物

第二卷

传

陕西人民出版社

编辑说明

一 随着中共党史资料,特别是陕西地方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大多党的历史人物革命活动经历也基本清楚。为了真实系统地记述革命和建设时期陕西地区党组织的主要创建人、领导人和有关重要人物的活动史实,弘扬他们为党、为国、为人民利益而献身奋斗、忘我工作的光辉业绩,学习和继承他们崇高的革命精神,我们编辑出版《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丛书。这既是党史研究领域内一项重要工作,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本丛书收录的范围和标准,大体包括:(1)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著名活动家、党团组织的创建人和组织成员、群众团体组织的主要成员、其他知名人士和著名活动家。(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地区特(地)委以上组织主要领导成员;同级政、军、群组织主要领导成员;革命根据地和地方红军的创建人或主要领导人;其他重要独立武装的军政指挥者;有重大贡献的知名人士和著名烈士。(3)抗日战争时期省级和省级以上党、政、军、群组织主要领导成员;著名抗日民主人士和抗日烈士;著名英雄劳模、爱国华侨

和国际友人。(4)全国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解放区、国统区和陕南解放区省级组织主要领导成员;同级政、军、群组织主要负责人;著名战役、战斗或重大军事行动的最高军政指挥员;著名战斗英雄、支前模范和革命烈士。(5)全国解放以后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机构成员(书记处书记、常委以上);省级人大、政府、政协、军区正副职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有重大突出贡献的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和著名革命烈士。

三、传记内容,以传主在陕西的活动为主,以传主与党有联系的活动为主。

四、本丛书暂收入已经去世的人物传稿。丛书传稿的编排大体上以成稿先后排序,各卷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

五、本丛书由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和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共同编写,并以多卷本陆续编辑出版,公开发行。

目 录

刘志丹.....	(1)
谢子长	(34)
刘天章	(63)
武止戈	(89)
许权中.....	(103)
唐 澍.....	(126)
赵伯平.....	(144)
何挺颖.....	(159)
王尚德.....	(174)
宋绮云.....	(206)
李敷仁.....	(229)
张奚若.....	(245)
李鼎铭.....	(268)
孔从洲.....	(286)
阎红彦.....	(302)
张达志.....	(339)

吕佑乾.....	(369)
焦维炽.....	(382)
王兆卿.....	(389)
蒲克敏.....	(398)
巩德芳.....	(405)

刘 志 丹

(1903—1936)

刘志丹，字景桂。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初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入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秋毕业后随军北伐。后被派到西北军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大革命失败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交通。1928年5月与唐谢等领导了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秋任中共陕北

特委军委书记，从事兵运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任西北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长、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总参谋长、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等职。曾遭到“左”倾错误执行者的迫害。1935年10月后先后任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总指挥。1936年4月14日在红军东征作战中牺牲。

刘志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金汤镇。祖父刘士杰是清同治年间的拔贡，秉性刚直，喜欢打抱不平，颇受乡亲敬重。父亲刘培基是乡里的秀才，刘志丹出生时，他在金汤小学教书，后转而经商，一度担任地方民团文职副官。刘志丹6岁后，随母回到金汤镇北30里的山村老家楼子沟，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稍长，就读于永宁山本县县立高等小学堂。由于军阀官僚和豪绅地主的残酷统治，陕北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刘志丹自幼生活

在群众之中，目睹家乡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十分同情穷苦人民。他和家里的长工张万银关系很好，亲昵地称张为“干大”（对长辈的一种尊称），有空即随张一起上山劳动。张万银也很喜欢刘志丹，常向他讲说贪官豪绅的罪恶，加以陕北一带，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为民除害的故事又流传甚广，这些都孕育了少年刘志丹对旧势力仇恨的种子。刘志丹勤奋读书，立志改变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但究竟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却还是茫然的。小学毕业后，十八九岁的刘志丹，抱着朦胧的改造社会、复兴中华的愿望，于1922年徒步来到离家六七百里的榆林，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时值五四运动之后，新思潮的影响逐渐波及偏僻的陕北，刘志丹迅即跟上时代的潮流，从此开始了他艰苦奋斗的革命生涯。

在时代的激流中成长

榆林中学是当时陕北23县惟一的一所中学，在文化落后的陕北高原要算是最高学府了，但浓厚的封建教育仍然充斥着这个学校。校长杜斌丞是个爱国人士，为了振兴教育事业，他力主改革校政，设法延聘名师，刘志丹入学后，正是魏野畴、李子洲、呼延震东等进步教师陆续来校任教的时候。由于他们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榆林中学的面貌开始改观，逐渐变得活跃起来了。刘志丹因为和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教师经常接触，深受他们的熏陶和影响，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李大钊等革命先驱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常常使他激动得彻夜难眠。不久，榆中学生在魏野畴帮助下发起组织学生自治会，1923年后，刘志丹当选为会长。在他的主持和进步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会积极开展各项活动：推销革命书刊，组织了社会科学研

究会、文学研究会、时事研究会、剧社、画社等团体，开办了平民小学，同陕北军阀井岳秀操纵的封建迷信组织同善社作斗争，并胜利地领导了榆中学生反对旧势力的一次罢课风潮。后来旅京陕西学生进步组织——共进社发展到榆林，刘志丹立即成了这个组织的骨干成员。他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亲自带头演话剧和为刊物撰稿，并以学生会名义，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揭露帝国主义利用教堂进行文化侵略、搞间谍活动的罪恶，劝说学生中的教徒退教，表现十分活跃。1924年秋，李子洲、王懋廷在陕北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支部，刘志丹等成为榆中第一批团员。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①。从此，他的眼界更加开阔，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更为得力。6月上旬，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陕北，刘志丹立即组织榆中学生积极响应，上街游行示威，开展援沪募捐，宣传抵制日货，进行街头讲演，声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潮，使闭塞的陕北高原顿时沸腾起来了。

刘志丹在陕北学生运动中，一开始就显示出他的组织能力。1925年7月，他被选为陕北学生联合会代表，赴三原参加全省学生代表会议和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因交通不便，旅途延误，到三原时学代会已经结束，只赶上参加共进社的会议，被选为该会第一审查委员会委员。他在会上作了关于榆林地区共进社活动情况的发言，并满怀激情地为大会题词：“共进！共进！同志引着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不惜牺牲，杀开血路！前途自有光明与幸福！”表现了高昂奔放的革命热情，充满了对未来前途的无限信心。

① 刘志丹的入党时间有两说，一说1925年在榆林中学转为共产党员，一说1926年在黄埔军校转为共产党员。

1925年秋,广东处于革命高潮,党组织决定选派刘志丹等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这时,他中学尚未毕业,校方不准退学,家庭也希望他毕业后再去。但刘志丹的心早已奔向当时的革命中心,便说服家庭,冲破了校方的阻拦,断然离开榆中,绕道山西,经京津乘船南下,于是年冬到达广州。翌年初,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苏联帮助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下创办的一所革命军事学校,充满着革命救国的热烈气氛。刘志丹到后,眼界为之一新,和政治教官恽代英、肖楚女,政治部宣传科长王懋廷及留校工作的第一期学员陈赓、唐澍等交往甚密。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关怀下,他热情学习,政治上也十分活跃。由于不服水土,一度曾患重病,医生让他休学,但他意志坚强,重病后仍坚持学习,不曾稍怠。

1926年秋,刘志丹在黄埔军校毕业,随军东征。这时,冯玉祥从苏联回国,成立国民军联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要求我党选派干部到其部队工作。冬,刘志丹奉命被派往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马部多系回民,实行的是封建家长制和雇佣军事教育,一说要打仗,从上到下,都伸手要钱。但由于回民尚武,骑兵较多,这支部队还有一定的战斗力。刘志丹到任后,耐心地向马鸿逵进行说服工作,指出:参加革命的军队,就要有革命的行动。征得马的同意,刘志丹在军、师、团、营逐级建立政治工作机关,制定新的军容风纪,又开展了新式练兵。回民战上和下级军官大都出身穷苦,灌输革命思想后,觉悟迅速提高。这支部队后来在解围西安、东出潼关、会师中原的战斗中,行动迅速,作战有功,这与刘志丹所做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分不开的。

次年春,豫陕正处在革命高潮中,被赶出陕境的吴佩孚余孽刘镇华部,还盘踞豫西山区作乱,刘志丹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

总司令的代表，去豫西收编刘镇华的军队。刘镇华阴险狡猾，不愿接受改编，但又怕得罪冯玉祥，尔后对己不利，便企图以重金收买刘志丹，要刘志丹在冯玉祥面前替他说好话。刘志丹立场坚定，严词怒斥刘镇华的收买阴谋，使其狼狈不堪，不得不答应接受改编。

时势造英雄。刘志丹这时虽只有23岁，但因为他一入党就完全置身于党的领导之下，性格坚强，勇于进取，乐于迎着一次又一次的风浪前进，所以很快成长起来了。

渭华起义展红旗

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背叛革命。6月下旬，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也在军队实行“清党”。他借“集训”为名，下令将刘志丹、宣侠父、方仲如、刘贯一等几十名在该部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扣押于开封，逐个进行“审查”。冯玉祥威逼共产党员“必须宣言脱离共党，听国民党之领导，守国民党之规则”^①，否则要“查明枪决”。刘志丹等毫不畏惧，断然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7月中旬，冯玉祥下令将这批党员押送出境，原想借湖北反动派之手杀害之。刘志丹等20余人便被分别装进两辆闷子车，送出武胜关，甩在湖北孝子店车站。这些共产党员机警地躲过了敌人的暗算，设法到武汉去找党。到武汉后，始知武汉政府亦已叛变，遂又辗转通过地下关系找到了党组织。按照党的指示，大部分同志被派往苏联，一部分参加南昌起义，刘志丹奉命回陕，担任省委交通，往返于上海和豫陕间，进行联络工作。

1927年9月26日，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根据

① 《冯玉祥日记》，北平东方书社，1930年8月版

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在革命的紧要关头,纠正了陕西党组织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陕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实行策略上的转变,并通过了农民斗争和军事运动等九项议案,强调党必须掌握武装力量,组织革命兵变,准备武装起义。

1928年1月上旬,陕西省委进行改组,撤销了犯有右倾错误的原省委书记耿炳光,改选潘自力为书记。新省委成立后,接连发出党内通告,部署武装起义,并具体划分了陕西各地的暴动区域。通告强调武装部队的起义必须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指示建制上接受军阀李虎臣收编、实际上由我党控制的新编第三旅许权中(中共党员)部积极准备起义。与此同时,刘志丹、唐澍、廉益民、吴浩然、谢子长等,陆续被派往该旅加强领导工作。刘志丹等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在许旅驻地洛南三要司和河南卢氏一带,帮助地方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建立赤卫队,培训革命武装骨干,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并公审和处决了几个恶霸地主,迅速扩大了革命影响。3月,渭华地区因“宣化事件”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陕西省委决定首先在这个地区发动起义,为了加强领导,正式成立陕东特派委员会,刘继曾为书记。4月6日,陕东特委根据省委关于渭华暴动的《行动大纲》,具体制定了起义计划。与此同时,省委又转发了1927年冬中央致朱德的信,强调革命军队一定要脱离军阀部队,作农民暴动的“副力”;并指示许权中旅迅速扩大力量,以配合渭华农民起义。这时,李虎臣乘冯玉祥主力离陕参加军阀混乱之际,发动了反冯战争,企图独霸陕西。李除以大部兵力围攻西安外,并调驻商洛地区兵力进攻潼关。唐澍、刘志丹等在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和组织部长李子洲的支持下,5月10日夜率领部队撤离潼关,开赴华县高塘,和5月1日在渭南崇凝镇与

已经爆发的农民暴动相结合,宣布正式起义,后在高塘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军民联欢大会,热烈庆祝工农革命军的诞生。刘志丹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通俗地说明了社会上贫富不均的原因,指出:要想不受穷,只有起来闹革命。大会正式宣布了西北工农革命军的诞生,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任前敌总指挥,刘继曾任政治委员,许权中任军事顾问。革命军近千人,下分4个大队、1个赤卫队和1个骑兵分队。革命军所到之处,大力帮助农民群众开展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进一步推动了渭华起义的发展,很短时间,东起少华山,西至临潼县,南靠秦岭,北到西(安)潼(关)公路200多平方公里地区的反动政权基本被摧毁,打土豪,分财物,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农民群众热情歌唱:“不爱银子不爱财,光爱工农苏维埃;不爱金子不爱钱,光爱人民新政权”。

渭华地处豫陕交通要道,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党领导革命军民在这里发动起义,使敌人大为惊恐。因此,从6月上旬开始,敌军先后向这里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由于起义军民团结奋战,头两次进攻均被胜利粉碎。6月19日,敌人又调集了孙连仲等3个师的兵力,在宋哲元指挥下,分左、中、右3路向革命军发动第三次围攻。因敌进攻兵力过强,我军原计划转移陕北的路线已被切断,根据情况的变化,革命军决定向南山撤退,以保存力量。为了阻击敌人,刘志丹率部在高塘附近骆驼渠的半坡上,和宋哲元亲自指挥的中路敌军1个师作战。骆驼渠是革命军司令部的前沿阵地,敌人用重炮连续轰击,战斗十分激烈。面对数倍于己之敌,刘志丹镇定自若、一面指挥革命军英勇阻击,一面掩护司令部和伤员迅速撤退,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形成对峙局面。与此同时,在唐澍的指挥下,五六百手持长枪、锄头的农民,英勇地击退了自赤

水西川进攻的敌人。革命军在完成阻击任务后,于22日相继撤退至洛南两岔河。但立足未稳,又遭李虎臣部5旅之众的进攻,唐澍壮烈牺牲,革命军被迫转移蓝田地区,只剩下不到200人。渭华起义失败了。7月初,根据省委指示,陕东特委在蓝田张家坪召开军事会议,刘志丹在总结失败原因时指出了以下几点:1.光杆斗争;2.军事冒险;3.脱离群众;4.烧杀政策。严肃指出了这次起义中政策上一些“左”的错误。会后,刘志丹和谢子长等回省委汇报工作,一部分同志离开部队分散活动,部队由许权中率领,离陕开赴河南确山地区,途中在邓县失利,全军覆没。

渭华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是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地区爆发的一次农民运动和军队配合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它打击了国民党在陕西的反动势力,扩大和加深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为刘志丹、谢子长等后来在陕甘、陕北领导武装斗争,创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出生入死的兵运工作

1928年7、8月间,刘志丹等冒着被敌人通缉的危险,化装潜回西安,向省委汇报了渭华起义的情况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秋,省委派刘志丹和谢子长等回陕北工作,任命刘志丹为中共陕北特委军事委员会书记。刘志丹在途经家乡保安时,曾和当年榆中同学、保安县党组织负责人王子宜及皖北暴动失败后回到家乡闹革命的曹力如一起,整顿地方党的组织。他们利用党员担任县教育局长职务的方便,安排党员和进步人士到全县7所小学,以学校为立足点,开展革命工作。冬,刘志丹到达陕北特委所在地榆林,参加特委工作。特委负责人杨国栋慑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主张只做点

宣传工作,不搞武装斗争,甚至荒谬地提出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刘志丹和特委其他成员一起,同这种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9年春,刘志丹返回保安,根据陕北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派大批党团员打入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的决议,开始以主要精力从事兵运活动。当时,保安民团团总路仰之横行乡里,群众恨之入骨,县长及地方上一些士绅与路也有矛盾。刘志丹和王子宜、曹力如一面分头联络士绅们,争取他们赞成改选民团,一面揭露路仰之欺压老百姓的罪行,鼓励广大群众到县长那里告状,要求改选团总。县长迫于人民压力只好答应改选。党组织又通过社会关系提出刘志丹、曹力如为团总候选人,并巧妙地争取了多数选票,使刘志丹、曹力如当选为正副团总。选举胜利后,路仰之收买了一部分人,企图拒绝刘志丹上任。党组织又及时发动广大团丁进行抗争,结果把路煞费苦心安排的拒绝刘志丹上任的示威,变成了欢迎刘志丹上任的仪式,使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刘志丹担任团总后,立即对民团进行整顿,废除打骂,改善生活,加强政治教育,建立党的组织,把一个本来反动的民团,改造成为党掌握的武装力量。

1929年7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刘志丹为候补常委。1930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在渭南举行全体会议,刘志丹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8、9月间,省委任命吉国桢为陕北特委书记,刘志丹仍继续负责特委军委工作,在陕甘一带活动。那时候,陕甘交界地区北至定边,南至淳化、耀县的桥山山脉,是个“三不管”的地区,军阀统治比较薄弱,不少土匪搞几杆枪就可割据一座山头,一些因反抗压迫走投无路的农民也常在此聚义,封建社团如哥老会、青红帮等也在这里占有地盘。刘志丹看清了这个特点,就号召党团员占山头闹革命。他常说:连土匪都可以在这些地

方称“山大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可在这里闹革命呢？从1929年到1931年，刘志丹、谢子长利用亲友等各种关系，先后打入陕甘边界一些军阀军队和民团进行兵运活动。刘志丹先于1929年夏秋，打入陕北军阀张廷芝部队；1930年春，又打入驻甘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任十六团副团长。陕北特委同时派张秀山、贺晋年、张东蛟、高鹏飞等一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相继进入苏部工作，并且在苏部秘密地建立了党的军委（张东蛟任书记），大力做争取群众，训练军事干部的工作。随后，刘志丹、谢子长又回陕北打入地方军阀谭世霖部队活动，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1930年夏，刘志丹、谢子长等随谭部驻防庆阳、吴旗交界的三道川，准备利用机会举行起义，不意突遭张廷芝的袭击而失败。

1930年8月中旬，刘志丹和谢子长同到绥德参加陕北特委（书记为赵伯平）第五次扩大会议，研究如何在陕北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决定继续进行兵运工作，条件成熟时举行起义，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这次会议正值立三“左”倾错误时期，按照立三“左”倾错误的要求成立了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谢子长、刘志丹分任正、副总指挥。但是，由于立三“左”倾错误很快就被纠正，实际工作中并没有贯彻执行。会议期间，特委曾提议由刘志丹继续担任军委书记，留机关工作，刘志丹以基层武装斗争更重要为理由，请求派他仍回陕甘边搞兵运，特委同意了他的意见，另由北方局派孔祥桢为军委书记。

9月，刘志丹回到保安，向党组织传达了特委会议精神，研究了扩大革命武装的计划。这个月的下旬，刘志丹即和曹力如等一起在永宁山一带组织革命武装。他们先是借用和陇东民团骑兵第六营的名义，到甘肃合水县太白镇以商借粮草为名，击毙该镇民团总黄毓麟以下10余人，缴获枪支60余支，骡马几十匹。战斗胜

利后，刘志丹带着这支队伍，驰骋于保安、安塞、合水、甘泉一带，几个月内使部队发展到 200 余人。人马发展了，刘志丹又抓紧机会在永宁山南石砭湾的深山密林里进行练兵。当时民谣曾有：“刘志丹练兵石砭湾，要把世事颠倒颠”等句。后因遭优势敌人“围剿”，转移途中失利。

1931 年春，刘志丹奉命继续和苏雨生合作，任该部团长，驻旬邑职田镇，准备起义，不慎暴露，被当地豪绅告发，刘志丹被捕，囚禁彬县，部队亦缴械改编。刘志丹“虽受镣锁囹圄，仍暗中策令其他同志工作，毫无惧怠”。旋经党组织和南汉宸、杜斌丞等通过杨虎城关系营救获释。

同年 4、5 月，刘志丹出狱后，根据省委指示，利用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又打进平凉甘军新编十三师陈珪璋部。陈明知刘志丹是共产党员，但对刘志丹的能力十分钦佩，又想利用刘志丹反对当地其他军阀张廷芝、谭世霖，扩充自己实力。刘志丹心中有数，亦借此以陈的名义在桥山的南端宁县成立了一个旅，号称十一旅，自任旅长，人枪 300 余，并不断吸收当地农民及共产党员参加。这期间，陕西省委曾有一个策动甘军 5 个旅兵变，建立桥山根据地的计划，并派高岗（时任省委交通）到平凉和刘志丹进行过联系。但是这些起义多系单纯的兵暴，没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且在路线上带有某种盲目性，因而都没有成功。刘志丹的十一旅也因与陈部发生火并而被打散。刘志丹在危急情况下安排了党的工作，连夜出走，只身回到南梁，以百折不挠的精神，集合起部分失散了的战士，沿着桥山山脉，逐渐又发展成一支二三百人的革命队伍。

刘志丹在兵运工作中，面对千变万化的复杂形势，出生入死，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胆略，一向被当作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他虽经多次挫折而从不气馁，并善于从实践斗争中不断总结

经验,探索前进的道路。这种利用军阀间的矛盾,发展革命武装的做法,当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策略原则的,但并不是根本办法。正像刘志丹后来所总结的:“利用军阀是暂时的,利用军阀的公开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好了条件,我们就单出去搞。”正反映了他思想认识上的日渐成熟。

从陕甘游击队到红二十六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9月22日,中共中央号召组织群众性的反帝运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全国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10月下旬,刘志丹领导的革命队伍在甘肃合水县灵锦庙同杨重远、阎红彦、师祝杰等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合,到南梁一带休整。是年冬,转移至合水县柴桥子。根据当时全国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部队改称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

1932年2月,根据省委指示,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后叛变)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改编之始,刘志丹即离部队赴省委汇报情况,随后在渭北搞了一段农运工作,又返回陕甘边。此时,游击队已分编为三、五两个支队,刘志丹任第三支队队长,率部在永寿、乾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5月10日,省委改任刘志丹为总指挥。这时,敌人部署重兵数旅“进剿”陕甘游击队,省委指示游击队立即北上。刘志丹主持召开队委会议,分析了敌情,认为分驻中部(今黄陵)、宜君、洛川之敌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一团战斗力弱,且距榆林、西安均远,增援不易;这一带又系山区,游击队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利于作战;于是决定向该地区行动。5月15日